

上 篇

20 世纪上半期的中国哲学

20 世纪上半期，是中国哲学的萌生和建构的伟大历史时期。中国社会在晚清政府腐败而又屈辱的统治下历经苦难，在民主革命的旗帜下，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了向西方学习的现代化历史进程，中国哲学的发展就是在这样一个历史条件下开始了。在向西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学习过程中，通过对传统文化的反思，中国学界开始了建构新哲学体系的尝试，在这个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斗争中艰难地完成了中国化的过程，并且最终完成了中国社会民主革命的历史任务。

第一章 20 世纪中国哲学的萌生

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初，中国哲学在西方文明的全面东渐的条件下开始萌生，一方面，一些初步的西方哲学思想开始传播到中国，引起了中国传统哲学的变更；另一方面，在西方哲学的影响下，中国开始有了哲学的学科。可以说，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 20 世纪中国哲学开始了一个艰难的哲学的现代化过程。

第一节 清末民初西学的全面东渐

历史跨入 20 世纪的前夕,1898 年,在中国大地上卷起了维新变法风云。进入 20 世纪后不久,1911 年又爆发了辛亥武昌起义。世纪之交在旧民主主义框架内发生的这两次社会变革,在中国现代化历史上,是变被动现代化为主动现代化的开端。全面意义上的西方哲学东渐,就是在这个从前者向后者推进的过程中发生的。

一、西学全面东渐的社会条件及其推动力

毫无疑问,世纪之交前夕发生的维新变法,作为一场政治运动是失败了。但是,中国迈向现代化的社会变革步伐并没有因此而停顿下来。相反,随着戊戌政变使以康有为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从顶峰上跌落下来,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上升到了社会的主流地位。在 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初中国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它们彼此交替,各有自己的时代。具体说来,1895 年中日甲午战争失败后,改良派代替洋务派,成为社会革命的主流;1898 年戊戌政变特别是 1900 年义和团运动失败后,革命派代替改良派成为 20 世纪初期中国社会革命的主流。因此,它们各自代表了世纪之交中国社会变革过程中的不同阶段。

基于这一点,它们之间存在分歧与争论,主要是在政治理想上,一个主张君主立宪,一个主张民主共和。但是这种分歧与争论不同于洋务运动时期的“师夷”与“反师夷”之争,也不同于变法时期的维新与守旧之争,而是资产阶级内部不同集团之间两种政治模式的分歧与争论。从社会变革的发展来说,革命是那个时代的必然趋势,因此革命派代表了正确的方向。不过,改良派对于社会变革许多具体问题的主张,也具有历史的合理性。这种现象的产生,主要是因为它们不但是在同一经济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而且还基本上是同时登上中国政治舞台的两个政治派别。因此,它们的目标和要求,都是要在中国实现资本主义现代化。而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它们都主张取

法西方，向西方学习，尤其对于引进西方哲学和西方社会科学，在认识和实践上基本是相同的，都是西方哲学全面启始东渐的推动力量。

改良派和革命派都主张向西方学习，这是由它们登上中国政治舞台时的社会历史条件决定的。其中主要是当时的中国，由于缺乏必要的经济、政治和科学基础与条件，产生不了把亿万群众从封建传统观念束缚下解放出来为社会变革鸣锣开道的启蒙思想体系。同时，他们还看到，这又绝对不能把希望寄托在维系旧的封建制度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封建旧学的朽木之上。然而，西方各国走出中世纪、迈向现代化成功的经验证明，不进行思想启蒙，没有新的哲学世界观作为精神支柱，要想使社会变革顺利进行并取得胜利，是难以办到的。就是在变法失败后维新派进行文化反思，以及革命派准备起义的过程中，他们在上述认识的基础上初步地提出了不仅要引进西方的制度文化，而且还必须输入西方的哲学社会科学的主张。提出这种要求和主张的，主要是在维新变法运动与革命派准备起义过程中涌现出来的具有现代意识的我国第一代新型知识分子。他们身处多灾多难之时，怀忧国忧世之思，在向西方学习、寻找真理，为中国探索出路的过程中，成为当时社会中最为自觉地承担时代重任的社会力量，也是西方哲学全面启始东渐的推动力量。

二、西学输入的方式、渠道和主要时间

在上述社会条件下，维新派出于对中国前途和命运的关心，在政治上进行了一场维新变法运动。在这个过程中，为了论证他们进行维新变法的必要性与合理性，他们创设译书机构，成立学会，开展译书活动；出版报纸和期刊，传播西方哲学；派人出国留学，培养传播人才。就这样，开始使西方哲学在中国传播开来。而这也正是革命派从组织上和思想上酝酿进行革命起义的时候。为了推翻清朝政府的专制统治，建立民主共和国，为此他们同维新派一样采取大体相同的形式制造舆论。其中，利用报刊传播西方哲学，也是一项重要的工作。

需要指出的是，在这个传播过程中，维新派和革命派不但传播方式相同，而且在传播渠道上都主要是通过日本间接输入的。因为甲午

战争后，出于对日本认识的变化，即认为日本输入西学取得了成功。因此，仿效日本维新变法成为当时爱国人士的共识。因此，不仅青年学生东渡，而且不少维新派和革命派为了逃避国内封建势力的迫害也大都前往日本。同时，从政治上讲，当时日本政府对待中国人较为宽容，特别是民间友好人士更是热情欢迎。所有这些都吸引中国青年学生和进步人士云集日本。这样，日本不但成为中国留学生和进步人士最为集中的地方，而且在这里，通过日文接触和学习西方哲学，使日本成为西方哲学输入中国的主要渠道。

而且，由于前面这些原因决定了本时期西方哲学的输入与传播，主要是 20 世纪的最初几年。因为这正是改良派失败进行反思和革命派起义前进行思想准备的时候，两者从不同的目的出发汇集到一起开展了这一工作。关于这一点，从翻译出版的西学书籍和中国学者发表的有关西方哲学文章两相映照即能证实。

前一方面，江南制造局译书馆提供的两个书目表，可资参考。一个是 1899 年的《东西学书录》，一个是 1904 年的《译书经眼录》。前后两个表分别反映了 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初西学著作翻译和出版的情况。把它们比较一下，便不难发现西方哲学在这个过程中急剧增长的趋势。从中可以看到，19 世纪末西方哲学已有所输入，进到 20 世纪的初年，西方哲学在输入的西学中占据的比例有了显著的增加。具体说来，在前表中自然科学各门所译书籍共 228 部，占总数的 41%，而工艺和兵制仅两类也占了总数的 19.3%。这说明，在 19 世纪末输入的西学和洋务运动时期比较，继兵工实用科学之后，自然科学仍然是西学输入的主流，政治方面的社会科学译书，虽然有所增加，但不十分显著。不过，值得提及的是，在这个表的分类中，第一次出现了哲学类——理学。这是西方哲学全面开始东渐的重要标志。其中收录了 12 部书，但查内容，大部分是西方人士所著形式逻辑和方法论之类的书籍，如《辨伪启蒙》、《理学须知》、《格致新知》。其余均与哲学无关，如《萃语考源》等。倒是在《议论》一类中，收入了《天演论》和《斯宾塞尔文集》。可见，19 世纪末西方哲学伊始东渐，数量很少，尚无经典

之作，而且目录分类不清，名目未当，这正好反映了西方哲学输入初始的情景。

到 20 世纪的头几年，西方哲学传播的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这可以从 1904 年的《译书经眼录》得到说明。在这里，兵部工艺之类的比例继续下降 仅占 6.3% 自然科学各门类稍有下降 占 23% 哲学政法等社会科学译书有了大幅度的上升，成为西学输入的主流。其中政治一类“交涉”——国际公法等不计算在内）收录 70 部 占总数的 13.1% 哲学类译书增加十分明显 共收录 34 部 占总数的 6.4%；哲学社会科学各类译书加在一起，占总数的 61.5%。

后一方面，中国学者发表有关西方哲学的文章，也是这样。上海人民出版社从 1965 年开始，先后编辑出版了《中国近代期刊篇目汇编》一书。据编者称 这部《汇编》辑录了从 1857 年到 1918 年 60 年间的近代期刊 共计 495 种 11000 余册的全部篇目。其中 从 1895 年到 1900 年发表的西方哲学作品，除了在一般西学著作或其他论文中夹杂有西方哲学的内容外，专题介绍西方哲学的论文只有 1899 年刊登在《新亚时报》第 10 册上的《培根论》一篇 数量极少 绝大多数有关西方哲学的文章 都是发表在 20 世纪的最初几年。其中 80% 的文章又都集中问世于 1903 年、1904 年和 1905 年三年中。

根据这些事实，可以说，全面意义上的西方哲学东渐，是发生在 20 世纪最初几年的事情。这虽然是西方哲学输入的全面起始阶段，但就中国新旧文化嬗变而言，却是一个新蕾茁长的阶段。先进分子开始觉悟到把西方哲学的各种思潮输入进来，作为社会变革的思想启蒙 这是 20 世纪中国哲学的一个历史起点和生动表现。

三、西方哲学传播的主要内容

根据社会变法和革命的需要，在西方哲学输入的内容上，从古代希腊罗马哲学，直到当时诞生不久的现代西方哲学，几乎都引进来了，但主要引进的还是近代和现代西方哲学。为了理解中国学者对西方哲学的传播及其研究，下面对传播中的几个重点进行具体考察。

第一，进化论与星云假说。这主要是从社会变革政治斗争的需

要出发而输入的。其中 传播进化论的作品 除严复翻译的《天演论》以外 还有梁启超的《天演论初祖达尔文学说及传略》(载《选报》第 13 期)、《吴新中节本天演论》(载《政艺通报》第 22~26 期)、《泰西达尔文及学说》(载《政艺通报》第 7~8 期 作者不详)以及《物竞论》(载《译书汇编》第 4~8 期 作者不详)等。

在这些作品中,对当时社会生活影响最为深刻的,无疑要数严复译出的《天演论》。他在激烈的民族斗争高潮中 从 1894 年开始 以极大的爱国热忱着手翻译《天演论》,以此向全国人民敲响了危亡的警钟 用来印证“不变法则必亡”的论断。他在翻译时 不是忠实原著 而是从当时中国的社会实际出发 有选择、有取舍、有评论 把它和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联系起来。这样,《天演论》实际上便成了原著的改写与再创作。在这部译著中,严复利用赫胥黎著作中描写自然中物竞天择的残酷现象,鲜明而突出地介绍了达尔文的生物进化学说,以此向国人发出警告 中国必须赶快自强 否则 就要沦为列强的奴隶。严复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即借介绍达尔文的进化论,阐明了时代的一个中心问题:中国如能顺应“天演”的规律而进行维新变法,就会由弱变强 否则 就将落得亡国灭种而被淘汰。与此同时 他还以《天演论》的观点为立论根据 先后发表了《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与《救亡决论》等重要政论,运用他吸取的西方资产阶级的进步观念,发动了对封建意识形态的挑战。

有关介绍星云假说的作品,除了刊登在 1903 年《大陆报》第 5 期题为《西哲之星云说及佛教之器世问论》 是一篇没有署名的专文外,其余都是散杂在作者的其他著作或论文中。如康有为的《诸天讲》卷九、严复的《天演论》按语“十义”以及鲁迅的《中国地质略论》等。

星云假说是在 18 世纪由德国哲学家康德和法国天文学家拉普拉斯提出来的。它在天文学上具有重要意义,而且由于它在哲学上得出的结论,有力地打击了形而上学的自然观,所以,当中国人向西方寻找真理,在输入进化论的同时,也注意到了星云假说对于人们思想解放的意义。由于封建统治阶级的需要 把董仲舒提出的“天不变 道

亦不变”的理论，变成了中国社会中人人必须遵守的信条，以此用来维护他们的统治。因此，针对这种理论，中国传播者在输入星云假说时，主要介绍了其中关于宇宙进化的科学论述。这样，随着这个学说和进化论、细胞学说等西方科学理论的传入，不仅使中国人对于宇宙天体起源有了新的认识而且主要是动摇了“天不变道亦不变”的理论基础，为中国资产阶级进行社会变革提供了理论根据。

第二，民主自由和近代认识论学说。这是从探索近代西方文明发生的根源与寻找中国如何走上富强之路的直接目的而输入的。这类作品较多。其中除了有摘译洛克的《人类理解论》、卢梭的《民约论》以及孟德斯鸠的《万法精理》等原著外，主要是中国学者撰写的介绍西方哲学的文章。这里着重分析一下梁启超的有关论著来说明这个问题。

在介绍西方民主和自由学说时 梁启超发表了《卢梭学案》、《法理学家孟德斯鸠之学说》、《政治学家伯伦知理之学说》和《功利主义泰斗边沁之学说》等。这里举《卢梭学案》为例进行说明。在这篇文章中，梁启超着重论述了卢梭提出的天赋人权，即自由与平等的学说并且借用卢梭说的“凡弃己之自由权者 即弃其所以为人之最也”的话，把近代资产阶级启蒙学者提出的自由、平等理论提升到了十分突出的高度，强调了自由对于人的极端重要性，认为“自由者凡百权理之本也 凡百责任之原也。责任固不可弃 权理也不可捐 而况其本原之自由权哉？”这是他介绍卢梭《社会契约》一书的重心所在 其用意是不难明白的。

第三，意志主义哲学。这主要是王国维渴望从西方引进“纯粹哲学”经过选择后传播的。这里所谓“纯粹哲学”实际上是指那些在引进过程中没有掺杂传播者任何主观政治目的，只是作为一种纯粹思维方式的哲学学说。王国维认为，在当时输入的西方哲学中，不论是达尔文、斯宾塞 还是培根、笛卡尔的哲学 都被传播者染上了浓厚的政治色彩 因而都不能算是“纯粹哲学”了。在他看来 只有叔本华和尼采的意志主义哲学颇有空谷佳人、遗世独立的气概，能够满足他的

要求。于是,王国维于1903年先后在《教育世界》杂志上发表了《叔本华之哲学及其教育学说》、《书叔本华遗传说后》以及《叔本华与尼采》等文章,从一个新的角度引进西方哲学。他在传播叔本华和尼采哲学时,较为注意从理论上对这些哲学本身进行探索和论述。例如,他对叔本华的意志论与解脱说以及尼采的“超人”与“强力意志”说特别是分析叔本华与尼采两人哲学的关系时,都是这样。因此,王国维最早把意志主义引进到中国来了。这在当时,确实适应了处在社会变动中的一部分知识分子追求真理、救亡图存的要求。

四、西方哲学传播的主要特点

通过前面的介绍与分析,可以看到西方哲学东渐起始时期的一些基本特点:

第一,推动西方哲学东渐的主要力量,是刚刚登上中国政治舞台的资产阶级的各个集团,如以康有为为代表的改良派和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在维新变法与辛亥起义前后,他们不仅是政治斗争的主要领导者,而且在文化思想上也是西方哲学的热情传播者。实际上,引进与传播西方哲学已经成为他们领导的推进中国社会变革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充分说明,西方哲学东渐是适应中国走出封建社会,迈向现代化的需要发生的,是与中国社会的进步事业联系在一起的。

第二,在输入西方哲学时,由于传播者对被传播对象的理解尚处在粗浅的水平上,所以多现贩现卖之作。然而,在当时知识饥荒、饥不择食的环境中,虽然不能说这种现贩现卖是毫无选择,因为在发现什么便输入什么的同时,其中为社会变革进行思想启蒙的内容,如达尔文进化论、卢梭自由平等观念,以及培根、笛卡尔提出的新的思维方式和科学方法,占据了显著的位置。但是,传播中的主要倾向却是“本末不具,派别不明,惟以多为贵。”^①这表现在文献形态上,翻译和介绍性的文章占了绝大部分,深刻论述与评价的论著十分稀少;就是这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89页。

些介绍性的文章，也多是根据国外流行的哲学史书籍进行的转述。即使这样，其中不少观点与被传播对象的观点也存在不小的距离。所以，西方哲学的消化与吸收，还难以做到，研究和传播尚处在浅层次的阶段上。这是西方哲学东渐全面启始时的真实写照，是不可避免的。

第三，西方哲学的传播在中国当时的社会生活中发生了一定的影响。特别是对于广大追求进步的知识分子，像是在他们面前展现出一个色彩斑斓的崭新世界，使原来那些只是埋头封建文化的人们大开了眼界。从中看到了在中国以外还有那么丰富、先进的知识存在。这就足以帮助他们以此敲碎箝制思想的枷锁，引导他们向一个新的目标奔去。正如胡绳谈到梁启超在这个时期传播西方哲学的积极作用时说的：“应该承认，梁启超在戊戌政变后到 1903 年是做了富有成效的思想启蒙工作，帮助许多原来只知四书、五经、孔、孟、老、庄的人们（特别是青年）打开了眼界，并且从封建文化的对比中，更看到自己民族的落后，更强烈地燃烧起救国和革命的热情”^①。这种影响不仅在当时的社会中可以发现，而且也为新文化运动打下了思想基础。不过，由于封建势力的阻碍，这种影响只是局限在一部分追求进步的知识分子中间。

第二节 进化论与中国近代哲学变革

鸦片战争的隆隆炮声，兆示着中国自此进入了一个新时代。这是一个新的政治时代，也是一个新的文化时代。西方文化开始以如潮之势涌入中国。

由于中国与欧洲之间有着将近二百年的绝少往来的历史间隔，中国对于突然面临一个比自己强大得多的外国势力的侵袭，是没有思想准备的。对于新进的、强大而野心勃勃的欧洲资本主义来说，发

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下册）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 第 691 页。

动这场侵略战争，本是蓄谋已久的打入中国市场的一个具体步骤，而对于处在衰朽、封闭的宗法制度和自然经济居于统治地位的中国来说，却是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无情的现实，逼迫着中国人不得不对国家民族的处境与前途重新进行思考，重新作出抉择。

与已往发生过的邻国扰边、海寇掠民不同，这次中国是在与一个全新的对手进行较量。这个新对手不但是以雄厚的经济实力为后盾，而且是以中国人所未曾接触过的先进科学技术武装起来的。因此，这既是一场政治上的遭遇战，同时又是一场文化上的遭遇战。于是，有关如何对待新来的西方文化问题，以及由此而来的如何对待本国的固有文化、如何对待中西文化的关系的问题，自此成为寻求救国方案的仁人志士们所无从回避而且必须解决的重大时代课题。中国文化二百来年的封闭状态终结了，以大规模的中西文化交流、冲突与选择为重要特色的中国文化新时期开始了。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中国近代史就是中西文化冲突与融合的过程。

西方的各种思想文化的涌入，打破了中国思想文化几千年来基本上独立发展的格局。形成了中西文化大汇聚的历史潮流，使近代中国思想文化呈现出纷然杂陈的生动局面。其中，进化论学说在中国的传播，对近代中国思想文化的影响既深且巨。从 19 世纪 90 年代到 20 世纪初的近 30 年里，进化论思想在中国思想文化领域取得一种普遍性的地位，成为近代中国许许多多追求民族独立和社会进步的仁人志士观察世界、变革现实的思想武器，推动了中国历史的发展。一时之际“物竞”“争存”“优胜劣败”等词成为人们的口头禅。对于那时寻求生机的中国传统文化来说，进化论就不仅仅是一种自然科学而且还是政治学、伦理学不仅是一种认识论还是一种价值观和人生观；不仅是一个描述世界的理论，而且是一个变革世界的方案。进化论是西方智慧的源泉，是东西方文化之差别的根源，也正因为如此，严复、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章太炎乃至后来的陈独秀、胡适等先进思想家们都曾积极地翻译、介绍、宣传进化论学说，并以进化论为思想武器，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全面、深刻的理性批判，

希冀促成中国传统文化以至整个社会的近代化，引起了中国近代思想文化的变革。这些变革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形而上学世界观的动摇和进化论世界观的确立

“天不变 道亦不变”形而上学世界观的形成除了“天人合一”的文化传统外，一个重要的基础就是古代天文知识的“盖天说”。盖天说“把天地看成上下对立的两部分宇宙”，“天圆地方”。天地的上下对立是永恒不变的：“天不坠地不陷”。从这种宇宙观出发，就必然推导出“尊卑贵贱”的政治思想和“天不变 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世界观。由于科学知识的局限（当然还有阶级和时代的局限），中国思想家长期不能打破“天不变”的形而上学的宇宙观。于是，“道不变”也就几千年来颠扑不破，成为维护封建专制制度的精神支柱和桎梏人们思想的精神枷锁。因此，要从根本上摧毁“天不变 道亦不变”形而上学的世界观，必须借助近代科学的力量。

鸦片战争以后，西方近代的天文学、地质学、生物学、物理学等近代自然科学知识陆续传入，冲击了中国传统的宇宙观，自然开始还原为外在的认识客体。进化论学说的引进，使这些“支离破裂”的科学知识贯通一体，形成了一个新的进化论的自然观：“一切僵硬的东西溶解了，一切固定的东西消散了，一切被当做永恒存在的特殊东西变成了转瞬即逝的东西，整个自然界被证明是在永恒的流动和循环中运动着。”^① 为中国近代资产阶级的政治主张和修正中国人对于时代和变革——接受进步人士的社会变革思想——的态度提供了科学基础。僵化的“天不变 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世界观赖以存在的基础坍塌了。

维新派领袖康有为通过广阅西书，吸取了大量的西方进化论的新学说与自然科学知识，使其对天地宇宙、人类社会的认识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尽破藩篱而悟彻诸天”形成了进化论的宇宙观，击破了不变天道观的谬论。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53~454页。

康有为汲取了康德、拉普拉斯星云说、哥白尼日心说和牛顿力学定律 向中国人揭示天地是星云长期进化而成。康有为说：“我之太阳系亦然 当初星云之瓦斯块 自西回转于东 其星云渐至冷却 诸球分离自转 遂为游星。”^① 太阳是星云不断旋转运动逐步聚集而成，太阳系各个行星是围绕太阳不断运动的产品，说明了天体有一个不断进化的过程。

地球与太阳产生的规律如出一辙，康有为指出：“吾地星既自日分气质而来 日全气体为火 故地之中心亦皆为火 故热力极大 有拒心力 离日自转 于是与天空相摩 积久则凝成外壳矣。”^② 也就是说，地球是由太阳系中的星云分离出来的，它不断与天空的气体相摩擦，凝结而成一个绕太阳旋转的行星。地球形成后仍在不断进化，天空之水蒸气相遇，化为雨雪降落在地面上，逐渐汇流成奔腾的江河和烟波浩瀚的海洋。地球由星云凝聚的过程中，表层冷却为高山为岩石，而将高热的岩浆包裹在地层内部，地球中心岩浆火力沸动，不能闭塞遏抑，时常爆发为壮丽的火山。火山喷发口必定中凹，高山之巅又有天池 瀑布似银河泻落九天 于是形成地球万山奔走、千川分流、起伏跌宕、气象万千的景观。

康有为吸取哥白尼的日心说原理，形成了天地是对立统一体的新概念，否定了传统的天地对立的旧观念。人不就是天上人吗？康有为说：“夫星必在天上者也 吾人既生于星中 即生于天上。然则 吾地上人皆天上人也，吾人真天上人也。人不知天，故不自知为天人。故人人皆当知天，然后能为天人，人人皆当知地为天上一星，然后知吾为天上人。”^③ 康有为这段精辟的论述展示了三个思想层次：第一个层次，从天体学上说，地球是天上的一颗小行星，天与地是对立的统一体，天地统一而后构成浩瀚无垠的宇宙。第二个层次，从“天人合

《诸天讲》 中华书局 1990年版 第 14 页。

《诸天讲》 中华书局 1990年版 第 18 页。

③ 《诸天讲》 中华书局 1990年版 第 1 页。

一'的观念出发 我们人类是住在'地球村'的居民 实系天上之人 人类社会与自然界是对立的统一体, 社会与自然统一构成物质世界。第三个层次, 站在人类认识自然、征服自然的高度, 人人都应该明白自己是天上人, 人与自然界是对立的统一体, 天不是不可知的神秘力量, 人也不是神创造的亚当与夏娃, 人属于大自然的一部分, 人应当认识自然, 并可以按规律改造自然。在中国哲学发展史上, 康有为运用西方先进天文学说, 第一次把天、地、人和社会四者统一为一个物质世界, 改变了传统的天地对立的旧观念。

康有为还把中国传统的“气一元论”与西方近代的天文学、地质学、物理学、生物学等科学知识杂糅在一起, 形成了一种朴素的进化自然观: “于无极、无无极之始, 有湿热之气郁蒸而为天。诸天皆得此湿热之气, 展转而相生焉。近天得此湿热之气, 乃生诸日, 日得湿热之气, 乃生诸地, 地得湿热之气, 蒸郁而草木生焉, 而禽兽生焉, 已而人类生焉。”^① 并从自然的进化之理悟出了人类的进化之理, 天道后起者胜于先起者, 人道后人逸于前人。冲破了“天不变, 道亦不变”形而上学世界观的束缚。

在此基础上, 康有为利用柏格森创造进化思想改铸“公羊三世”说, 以“托古改制”的形式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将近代资产阶级维新变法的主张提高、升华到历史哲学的高度。在戊戌变法以前, 康氏把“据乱世”称为“暴王之酷政”, 即封建专制时代; 把“升平世”称为“行君主之仁政”, 即君主立宪时代; 把“太平世”称为实行民主制即民主共和时代。我们知道, 君主立宪和民主共和都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政体, 可见这时他所说的“升平世”与“太平世”之间没有质的区别。戊戌变法以后, 康有为流亡海外, 更广泛地接触西方哲学, 思维方式又有了变化。他在《大同书》中写道: “大同之进化不一, 而自集议联邦之始至于大同太平之时, 更变甚多, 不能一律。今以三世表而分之。”^② 接着他

^①《康子内外篇》, 中华书局 1988 年版, 第 17 页。

^②《大同书》, 古籍出版社 1956 年版, 第 90 页。

专门列出一张《大同合世三世表》重新阐释“三世说”第一“据乱世”是“各国帝王、君主位号、权力”。国内等级森严“有世爵、贵族、平民、奴隶之别”。这是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合一的封建专制社会。第二“升平世”的国体都是“始立公政府 有议员、有行政官 以统各国”在世界上相同的资产阶级国体内有两种政体，一种是“各国多为统领 亦略有帝王统于公政府”这属于君主立宪制的形式 另一种是“渐削帝王、君主位号 改为总统、议长”这属于民主共和制的形式。第三“太平世”已经取消国家“无国而为世界”，“议员但为世界人民之代表”取消国界就可以取消军队“无国、无君主 亦无兵 无兵权”。“太平世”还取消私有财产“人民无私产”“银行归于公”即无私产可以达到人人平等。“太平世”是无国家、无军队、无私产、无贵贱、人人平等的大同社会。在这里 康有为把“升平世”与“太平世”进行了质的区别 从“据乱世”(封建社会)到“升平世”(资本主义社会)再到“太平世”(大同世界)人类社会有序不乱地进化 每一阶段都发生质的变化，产生新的社会形态，这个历史进化过程是创造进化的过程，而不是庸俗进化的过程，这显然是受到柏格森创造进化论和傅立叶空想社会主义理论的启迪。标志着一种新的世界观即资产阶级进化论的世界观在中国的诞生。

严复通过在报刊发表文章和翻译赫胥黎的《天演论》，全面系统地介绍了达尔文的进化论学说 宣扬“世道必进、后胜于今”的观点，批判“好古而忽今”的复古主义。并立足于中国近代救亡图存的现实，对斯宾塞、赫胥黎、达尔文等人的思想进行整合，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进化观。

首先，严复对于传统哲学的本体观念进行了批判。严复很赞同约翰·穆勒的观点“人心于物 所谓知者 尽于觉意 至其本体 本无所知 亦无由知。”^①在他看来，传统哲学中讲的各种本体都是不可感觉因而也是不可认识的。他说：“谈理见极时 乃必至不可思议之一境，

严复译：《穆勒名学》 商务印书馆 1981 年版 第 58 页。

既不可谓谬而理又难知”；理学中不可思议之理亦多有之如天地元始、造化真宰、万物本体是已^①。这里所说的“理学”即哲学，这里所说的“谈理见极”即讲到哲学的本体问题。对于“理学”的形上学性质，严复有过进一步的说明：“理学，其西文本名，谓之出形气学，与格物诸形气学为对，故亦翻神学、智学、爱智学。日本人谓之哲学。”^②，他所说的“形气学”即亚里士多德所说的“物理学”，也就是研究自然世界的科学；他所说的“出形气学”，即亚里士多德所说的“物理学之后”，也就是研究形而上学的哲学。这里的“不可谓谬”即不能证伪；这里的“理又难知”即不能证实。在严复看来，哲学总要讲形而上学的本体，而这种形而上学的本体既不能证实，又不能证伪，都是不可思议的。

严复从实证主义原则出发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批判，特别是对传统形而上学本体观念的批判，具有十分重要的哲学意义。其意义与贡献在于：在中国哲学史上第一次运用现代哲学的眼光，对传统形而上学进行了冷静的审视和深刻的批判，敏锐地指出了传统形而上学本体观念的超验性质导致了本体的不可证明性，造成了本体与现象的截然二分和对立。严复的这一思想，真正击中了作为传统形而上学要害的世界二重化问题，从而真正超越了传统哲学本体论。只有通过这种批判和超越，中国哲学才能走出传统哲学本体论的思维范式。

其次，建立科学宇宙论。严复在批判传统哲学本体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国哲学发展的新方向——把宇宙论从本体论中剥离出来，建立科学宇宙论，取代传统本体论，使中国哲学走向科学化、实证化的道路。严复建立了中国哲学史上第一个完全近代意义的科学宇宙论体系。用他的话说，这个科学宇宙论体系可以称之为“天演论”。所谓“天演”也就是宇宙进化的意思。

严复的“天演论”的解释系统，直接采用了牛顿力学和达尔文进

① 《严复集》中华书局 1986年版 第1380页。

② 《严复集》中华书局 1986年版 第1029页。

化论的框架。他认为：“大宇之内 质力相推 非质无以见力 非力无以呈质。”^① 他所说的“质”指力学上的质点 泛指物质。所说的“力”既指质点所具有的吸引力与排斥力，又指机械运动所产生的能量，泛指运动。在他看来 物质与运动是统一的 不可分割的。没有物质 即没有运动；没有运动，物质也不能显示其存在。整个宇宙就是运动着的物质和物质的运动。“质”与“力”的相互作用构成了“天演”的过程。

严复进而认为，整个宇宙运动是一个统一的进化过程。这个过程是“由纯而杂”的发展，“万化皆始于简易 终于错综”^②。从太阳系来说 最初只是原始星云 而逐渐演化成为太阳、地球及诸行星。从地球来说 生命世界也有一个极复杂的进化过程：“虫鱼禽与兽人之间 衔接返演之物 日以渐密”即使是人 亦“为天演中一境 且演且进 来者方将”^③。

在严复看来 这一进化过程是自然界的自己运动 是宇宙中“力”与“质”相互作用的结果 而不存在什么非自然、超自然的造物主和推动者。他十分重视斯宾塞的关于“天演”的界说：“天演者 翕以聚质，辟以散力。方其用事也 物由纯而之杂 由流而之凝 由浑而之画 质力杂糅 相剂为变者也。”^④ 他认为：“所谓质力杂糅 相剂为变者 亦天演最要之义，不可忽而漏之也。”^⑤ 这里的“翕”与“辟”是“质”与“力”的相互作用所呈现出来的两种态势。“翕”是指质点在相互吸引力的作用下集聚起来形成各种刚体；“辟”是指质点在集聚过程中产生热、光、声、运动 散发出能量。他举例说 太阳系的形成演化 就是这样一个“翕以聚质 辟以散力”的过程。一方面 原始星云弥漫六合，质点本热至大，逐渐通过吸引力收摄成天球，太阳居中，八大行星外绕 各各聚质；另一方面 在这聚质过程中又耗散能量 地球则日缩，

① 《严复集》中华书局 1986 年版 第 1320 页。

② 《严复集》中华书局 1986 年版 第 1327 页。

③ 《严复集》中华书局 1986 年版 第 1325 页。

④ 《严复集》中华书局 1986 年版 第 1327 页。

⑤ 《严复集》中华书局 1986 年版 第 1328 页。

彗星则渐迟，八大行星之周天皆日缓，终久将合入其他天体之中。正是通过“质”与“力”、“翕”与“辟”的运动，使得宇宙间的事物由简单到复杂，由流动到凝固，由混沌到分明，构成了生生不息、动动不已的宇宙演化过程。严复认为，这就是对宇宙演化的最合理的说明。他自豪地说：“造物立其一本，以大力运之，而万类之所以底于如是者，成其自己而已，无所谓创造者也。”^①

严复又指出，生命世界的进化有其规律性，这就是由达尔文所揭示的“物竞天择”原理。所谓“物竞天择”就是“物竞者，物争自存也；天择者，存其宜种也。”^②即生存竞争，优胜劣败。在严复看来，自然界的进化就是通过这种严酷的生存竞争而实现的。这种“物竞天择”的原理在生命世界是普遍适用的，动植物如此，人类亦然。在人类社会中，也同在动植物中一样，存在着严酷的生存竞争。这是因为人类本来就是由动物进化而来的。

由于严复在强调牛顿力学的同时又引入了达尔文进化论，因此他所建构的宇宙论体系没有把空间看做是凝固的，没有把空间与时间割裂开来，而把宇宙看做是一个生生不息、动动不已的自然演化过程。这样就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牛顿力学的机械性。

严复的科学宇宙论，对于中国传统哲学具有双重的意义。一方面，这个崭新的宇宙论以其完整的系统的科学框架和科学内容，改变了宇宙论与本体论相结合的中国哲学传统，取代了传统本体论，真正开启了中国哲学科学化、实证化的新方向。另一方面，这种科学宇宙论的确立，又带有中国传统哲学的巨大印记。把科学思想经过不断的加工、提炼、改造，使之最终成为哲学认识的思维框架，正是中国哲学的一大传统。先秦哲学的阴阳思想、五行思想、天地人相统一思想等辩证思维框架，都是经历了这一过程而形成的，都可以在古代自然科学（主要是天文学、地理学、农学）中找到它们的原型。对于学贯中西

① 《严复集》中华书局 1986 年版 第 1325

② 《严复集》中华书局 1986 年版 第 16 页。